

欧洲文明的复杂性

——读莫兰《欧洲的文化与野蛮》^①

[法] 陈力川

一个“好的欧洲人”是能够“超越欧洲思想的人”。^②

——尼采

《欧洲的文化与野蛮》是法国当代社会学家、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于2005年10月出版的一本小书,其中的三个章节来自当年5月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三篇演讲稿:《人类的野蛮与欧洲的野蛮》,《欧洲文化的解毒剂》,《反思20世纪的野蛮》。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意义,或许可以说,这是“思想的欧洲”反省“行动的欧洲”。作者的目的是不是忏悔,而是通过对欧洲文明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找到消弭野蛮性的解毒剂,抵抗野蛮要从反思野蛮和正视受害者开始。

从野蛮的罗马征服文明的希腊开始,西方文明的发展伴随着武力征服、贩卖黑奴、殖民掠夺、种族歧视、宗教迫害、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极权主义等多种形式的野蛮行为。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的殖民化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结束,欧洲对世界的殖民统治持续了近五百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都曾饱受欧洲殖民主义的祸害。殖民形式的野蛮一方面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与一神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排他性有关。欧洲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宗教清洗和种族清洗就是

^① Edgar Morin, *Culture et barbarie européennes*, Editions Bayard, Paris, 2005.

^② Jean-Pierre Faye, *L'Europe une*, Les philosophes et l'Europ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2, pp. 233 - 234.

证明。从反犹太教到仇视犹太人,从反伊斯兰教到仇视阿拉伯人,能看出从宗教清洗到种族清洗的过渡。莫兰从既不美化欧洲,也不丑化欧洲的立场出发,客观地考察欧洲“文明的复杂性”。基督教无疑成了他的重要分析对象。

罗马帝国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前对其他信仰和神灵还是相当宽容的。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在罗马帝国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在传播普世福音的同时也暴露出它的强烈的排他性: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不宽容性。这种排他性,或者说不宽容性的神学基础是:只有上帝启示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其他教义都是异端邪说。但犹太教与基督教至少有一点不同,犹太教可以将自己锁在与上帝达成的圣约之中,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然而基督教传布信仰和劝人改教的热忱发展到极端却可以导致摧毁其他宗教和信仰。

例如 1492 年以前的西班牙,在伊斯兰地区安达卢西亚(Al Andalus),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能被接受;而在基督教地区,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也相安无事。那么 1492 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世人都知道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此开始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一年也是西班牙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军队在历时十年的战争后,攻占了伊斯兰教的最后一个堡垒——摩尔人统治的格拉纳达(Granada),随即颁布法令,强迫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改信基督教和被驱逐出境之间作出最后选择。1502 年西班牙驱逐了大量拒绝改教的穆斯林和犹太教徒。那些真心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作为基督徒的权利先是受到了承认和尊重,但是很快发现有许多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口是心非,表面上是基督教徒,暗中却继续信奉阿拉和耶和華,而且还有使基督教伊斯兰化或犹太教化的行为,这就变得不可容忍了。于是西班牙设立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惩罚那些被判定口是心非的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当很难断定他们是否真心诚意改信基督教的时候,就开始驱逐男性摩尔人。这就从宗教清洗开始走向种族清洗了。同时在美洲,宗教的不宽容也导致西班牙的殖民者彻底摧毁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存在的宗教。在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也伴随着大规模的宗教清洗和宗教战争。例如 16 世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后发生的宗教战争,开始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内战,从 1618 年到 1648 年演变为十多个欧洲国家卷入的宗教战争,历时三十年,直到 1648 年 10 月神圣罗马帝国与参战各国签订《维斯特伐利亚和约》才告终,这个和约同意各国和各公国君主将各自信奉的宗派作为国教,这等于放手让各国进行宗教清洗。不用说,参加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的公国确立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参加德意志新教联盟的各诸侯确立了新教的统治地位。英国国教的确立也伴随着对天主教徒的驱逐,16 世纪有大

量英国天主教徒避难法国。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 1598 年签署的南特法令虽然暂时实现了宗教和解,亨利四世本人也放弃了新教,改信天主教,但是路易十四于 1685 年废除了南特法令,限制新教徒的权利,并发生龙骑兵有组织地迫害新教徒的事件。当时只有在宗教战争后获得独立的荷兰还略有宗教宽容的气氛,天主教徒、路德教徒、犹太教徒和无神论者基本上相安无事。许多在其他国家禁止出版的著作也得以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

莫兰在《欧洲的文化与野蛮》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欧洲人道主义的两副面孔。“欧洲的人道主义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当我们考察人道主义本质的时候,却会得出两种非常不同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来自波兰哲学家克拉考维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他看来,欧洲人道主义源于犹太基督教教义:《圣经》中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在《新约全书》中,上帝化身为人。对此,捷克哲学家帕托卡(Jan Patocka)反驳说,欧洲人道主义的源头在古希腊,因为人的精神和理性是在希腊思想中获得了独立……我们可以说事实上这两个源头互不排斥,是犹太基督教教义和希腊思想的结合创造了欧洲的人道主义。第一个源头,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化身为人,如果说能带来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会导致幼稚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狂妄自大。人一旦摆脱了上帝,就会抢占宇宙的主体和中心的位置……这个人道主义有两副面孔,一个是统治者,另一个是博爱者……人道主义的第一副面孔如果不说是狂妄的,至少也是虚妄的,将人置于上帝的位置,并使人成为宇宙唯一的主宰,并赋予人征服世界的使命。这就是笛卡尔赋予科学的使命: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笛卡尔的使命感被布封和卡尔·马克思继承,直到很晚的时候,也就是从 1970 年开始,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定胜天的使命感才破碎。人们发现征服实际上不可控制的自然导致了对生物圈的破坏,还会因连锁反应使生命和人类社会遭到破坏:这种征服具有自杀性。我们应当转向人道主义的第二副面孔,对所有人的尊重,不论性别,种族,文化和国家。”^①

我们知道欧洲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承认人道主义博爱思想的普世性,而是将其视为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的特权,将世界上的其他人种或视为不文明的野蛮人,或视为落后的劣等民族,或视为神秘莫测的民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道主义的第二副面孔“博爱”是与理性批判精神,或者说理性的自我批评精神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历史上的宗教迫害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对

^① Edgar Morin, *Culture et barbarie européennes*, Editions Bayard, Paris, 2005, pp. 36 - 38.

主义的博爱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在欧洲将野蛮施加给自己，也施加给世界的时候，一个“思想的欧洲”开始了对这个“行动的欧洲”的反省和批判，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正是在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后裔中产生的，莫兰在书中列举了三个人：西班牙的德拉斯·卡萨斯，法国的蒙田和荷兰的斯宾诺莎。

天主教神甫、历史学家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 de Las Casas, 1474—1566)的直系亲属中就有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他在作为随军神甫参加西班牙远征队期间，见证了西班牙征服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联想到天主教迫害犹太教徒的家史，他对印第安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返回西班牙后，他谴责殖民制度，呼吁停止对印第安人的虐杀，被授予“印第安人保护官”的称号。他晚年著有《印第安人史》一书，他说：“印第安人与其他人一样，也是有灵魂的人。他的观点遭到教廷的拒绝：既然耶稣从来没有到过南美洲，怎么能把印第安人看做人呢！”^①或许出于策略的考虑，德拉斯·卡萨斯回避了黑人是否与白人一样也有灵魂的问题，但他保护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场无疑宣扬了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是对欧洲种族歧视、殖民行为的反戈一击。

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的母亲那一支是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后裔。蒙田的思想以怀疑主义著称，他也拒绝将美洲印第安人视为蛮族。他说：“被人们称为野蛮人的人是不同于我们文明的文明人。”莫兰评论说：“欧洲野蛮的表现之一是把他人说成不同于自己的野蛮人，而不是赞赏这种不同，并把它看做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增进人类关系的机会……在政治方面，蒙田一向谨小慎微，但他始终坚持宽容的伦理学。他支持国王为避免宗教战争而作的一切温和的努力。”^②从古希腊把不讲希腊语的民族叫做野蛮人，到中世纪基督教将异教徒视为野蛮人，再到蒙田将所谓“野蛮人”称为另一种文明人，“思想的欧洲”在对“行动的欧洲”的纠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本身就是犹太人，他的初衷本来是成为犹太教的教士，但他质疑犹太人是“上帝选民”的说法，或者说试图重新解释这个观念。斯宾诺莎在生前匿名发表的唯一著作《神学政治论》中讨论“希伯来人的天职”时说：“每个人的真正幸福和天佑完全在于享受善良的事物，而不在于自负只有自己有这种享受，别人都在被摒弃之列。”^③“……天赋的才

能并不为任一民族所专有，而是为人类所共有。”^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并无分别。上帝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仁厚，慈爱。”^⑤他还引用使徒保罗的话说：“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非犹太人的上帝。”^⑥莫兰评论说：“斯宾诺莎否定不现实的上帝选民说，使犹太人的身份世俗化，从而超越了基督教，回归普遍主义的哲学。”^⑦尽管斯宾诺莎生活在相对宽容的阿姆斯特丹，但他被犹太教会开除后成为一个手工艺者，以打磨眼镜片为生，有一次还险遭暗杀。我们知道，当年耶稣遭到法利赛派控制的犹太教会的迫害，原因之一是他宣扬爱与仁慈超出犹太人的范围，他以上帝之子的身份宣布天国并非是为犹太人准备的，而是所有上帝信仰者的归宿，这就将基督教的普世精神与犹太教的神选教条对立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继承的其实是耶稣的精神衣钵。

我们知道欧洲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经过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弘扬最终产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该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政治联合体的目的是保护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莫兰在《欧洲的文化和野蛮》一书中列举的历史人物中，有一个叫维克多·舒乐彻尔(Victor Schoelcher, 1804—1893)的人。1848年，时任法国殖民地副国务秘书的舒乐彻尔，推动法国议会通过了在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令，从而使26万奴隶获得了自由。在欧美国家废除奴隶制的历史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首先于1794年废除了奴隶制，但是1802年又被拿破仑重新恢复。接下来是英国于1807年通过了在大英帝国内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但是直到1834年才在大英帝国全境禁止了奴隶制。法国于1848年再次废除奴隶制度后，美国总统林肯于1862年南北战争期间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并于1865年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跟进，最后是古巴和巴西分别在1886年和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⑧20世纪中叶在亚非拉三大洲发生的非殖民化运动可以看做废除奴隶制的逻辑结果，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们以“自由”的名义要求民族自决。这说明西欧在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同时也发明了野蛮性的解毒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箴言，自由和平等的口号是在1789年的法

① Edgar Morin, *Culture et barbarie européennes*, Editions Bayard, Paris, 2005, p. 40.

② Ibid., p. 42.

③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出版社,1982年,北京,第50页。

④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出版社,1982年,北京,第52页。

⑤ 同上书,第57页。

⑥ 同上书,第61页。

⑦ Edgar Morin, *Culture et barbarie européennes*, Editions Bayard, Paris, 2005, p. 43.

⑧ 2001年5月,法国议会还率先立法承认奴隶制是反人类罪行,但迄今为止,英国、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尚未对历史上实行的奴隶制作正式道歉。

国大革命时代提出来的,而博爱的口号是在 1848 年的共和革命中补充的。正是在这一年,法国议会颁布了在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令。

莫兰在《欧洲的文化和野蛮》一书中还提出了“两个全球化”的概念。首先全球化时代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接踵而来的殖民征服和贩卖奴隶时就开始了。16 世纪初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使地球真正进入了互通有无的全球贸易体系。然而就在对其他民族征服和奴役的同时,就在商品和贸易全球化的同时,欧洲也将她的自由与人道主义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奴隶制的废除、殖民地的独立与这个思想的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有为数不少的欧洲移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去,例如欧洲移民中的精英分子在阿根廷和巴西的独立中起的作用。每个时代的霸权,从黄金世纪的西班牙到现在的美国,都为了争夺经济利益而推行“经济贸易全球化”,虽然人道主义思想的全球化与经济贸易全球化相比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也没有强权政治的推动,但它时缓时急的进展从来没有停止过。莫兰最关心的好像是“经济贸易全球化”和“人道主义思想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导致苏联体制和官僚主义经济的崩溃;而苏联的解体又使人权民主思想不仅在苏联的附属国,同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传播开来。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归结为同化或平庸化,它也在引发人道主义思想的全球化,两者虽然不可等同,但是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莫兰还提出一个“地球祖国”(Terre-patrie)的概念。他认为祖国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养我们的母亲大地,二是公正合理的父权国家。莫兰承认“地球祖国”这个概念尚未得到全世界大部分人的认同,但他相信技术与经济的全球化会促进这个地球意识的觉醒。因为全球化时代危机四伏:

“文明与野蛮一向并肩而行。我们看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卷土重来。所引发的某些事端告诫我们一场宗教战争,或一场文化或文明之间的战争是可能的。”^①

“野蛮的威胁甚至藏在貌似对抗野蛮的战略后面,最好的例子是广岛。我谈了很多奥斯威辛和古拉格,我们也不能忘记广岛。”^②

“今天技术经济的发展导致生物圈的破坏,生物圈的破坏带来人类文明的破坏。换句话说,(地球)这艘太空船正在驶向灾难,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控制。”^③

莫兰主张欧洲人对历史上发生的野蛮行为,既不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也不应背负内疚的负罪感,而需要有一种双重意识:一是对野蛮的意识,二是对人道主义、普世精神、地球祖国的意识,这种双重意识既是欧洲文明自身野蛮性的解毒剂,也是战胜新危险的有效办法。“反思野蛮是为更新人道主义作贡献。”^④

人类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說成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文明和野蛮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反相成的,而且人类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是不可逆转的。不唯欧洲文明如此,任何一个文明都是文化和野蛮的混合物,任何文明都有其深刻的双重性和复杂性。但不是任何文明都善于反省自身的野蛮性,从而找到消弭野蛮的解毒剂。在这一点上,莫兰不愧是尼采说的那种能够“超越欧洲思想”的欧洲人。

^① Edgar Morin, *Culture et barbarie européennes*, Editions Bayard, Paris, 2005, p. 58.

^② Ibid., p. 92.

^③ Ibid., p. 59.

^④ Edgar Morin, *Culture et barbarie européennes*, Editions Bayard, Paris, 2005, p. 94.